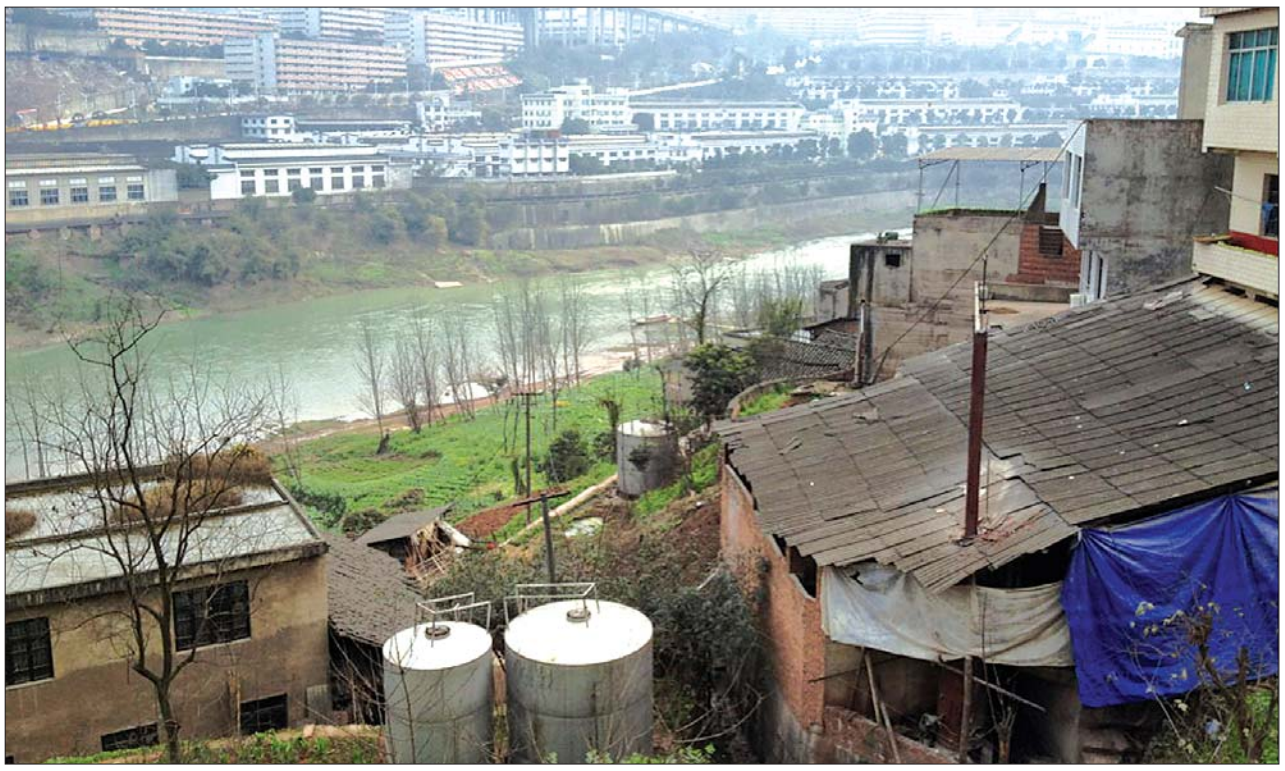

河对岸就是茅台集团的大片厂房。 石念军 摄

# 不想喝为啥还要喝

## ——一名基层官员眼中的官场“酒经”

本报记者 鲁超国 实习生 孟小雨 杜彩霞

3月14日,全国两会闭幕了。作为县直某部门一把手的赵先进(化名)从北京招商引资回来了,当晚同事和朋友要给他接风,被他一口回绝了。即使在平时,能回绝的酒局他也尽量回绝。

他的确需要休整一下了,在北京的日子里,他的神经基本上没有清醒过。尽管去之前他专门挑选了一些酒量大的精兵强将替他挡酒,可是大量的酒精还是每天在他的胃里燃烧。

“请客不喝酒基本上等于没请,酒不好了不如不请,酒喝少了显不出诚意。”赵先进总结,有些酒不喝还真不行。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公款吃喝”。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提案中,一个数字刺痛了人们的神经: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元,有委员提交了“‘三公消费’禁喝茅台”的提案,有的代表建议将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论罪……可是,当下官场几乎是无酒不成席,而且是无好酒不成席。1月10日,《人民日报》发文批官场“酒文化”:“在公款消费的助推下,官场上的饮酒之风可谓登峰造极,以至享誉华夏的茅台酒已经事实上跻身奢侈品行列。”

喝酒已经成为“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曾经在某县挂职调研两年的北大博士冯军旗在自己的论文中这样写到。

然而,“酒精”考验的公职人员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不少人都从内心抵触。但是,公款吃喝就像无法停止的旋风,把越来越多的人卷抛起来,让他们身不由己……

### “我们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

“可以说,我们是公款吃喝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这事儿管好了,绝大多数人都高兴!”两会上福建代表团鲍绍坤的一席话,算是说到赵先进心坎里去了。

这在官场的酒桌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好像谁都不愿喝,可是又必须喝。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沾酒。我更愿意吃老婆炒的酸辣土豆丝,然后陪女儿看会儿电视。”40多岁的赵先进称自己酒量不大,“以前喝两瓶啤酒就不行了”,现在,通过十多年的锻炼,他能喝半斤白酒了。

前段时间体检,“三高”依然有增无减,医生嘱咐他:一定要戒烟戒酒。

然而两会期间,赵先进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的肚子里每天要灌进去5斤酒,包括白酒、红酒和啤酒。而他还是喝得少的,有的人一顿饭就能喝进去十多瓶啤酒。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每天,他和同事们脸上堆满了笑意,更换着旁边的主宾和副宾,陪他们将一杯杯浓度不同的液体灌进嘴里,酒精在胃里燃烧着,一次次地刺激着早已麻木的神经。

对方如果喝得高兴,那气氛很快就被点燃;如果对方实在不愿喝,也不勉强,一句“我干了您随意”,先把自己放倒,这样至少显示出了诚意。

赵先进说,这次北京之行“战果”颇丰,有几个投资项目已经达成意向,同时,还结识了一些北京的“领导”。

“我是一个手里拿着药,一个手里抓着酒瓶子。”赵先进说,“还有人更厉害,心脏病,怀里揣着救心丸,喝酒的时候一点也不少喝。”

冯军旗2008年挂职时也深有体会,他最怵头的就是喝酒,挂职两年,他也因喝酒付出了代价:肠息肉。

2009年发布的《中国公职人员健康白皮书》披露,公职人员级别越高则健康状况越差,领导岗位公职人员的体检异常率高达98.5%。《武汉晚报》去年11月14日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体检中心发布的湖北省公务员健康体检统计报告显示,九成公务员身体存在不同程度异常,约34%的公务员患有脂肪肝、肝囊肿、肝内胆管结石等肝病,“酒精肝”成为公务员第一职业病。

**■“酒精”考验的公职人员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不少人都从内心抵触。但是,公款吃喝就像无法停止的旋风,把越来越多的人卷抛起来,让他们身不由己。**

**■更多的时候,酒则充当了官场上关系运作的一种润滑剂,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

**■“想喝一瓶货真价实的茅台不容易”,但是有意思的是,“有时候明知道不是真的,还是要喝。”**

### “如果领导一口干了,心里会升腾起一丝暖暖的感动”

既然酒喝多了伤身,很多人从内心里又都不愿喝酒,为什么还要喝?赵先进用简单的两个字回答:“国情。”

在中国,无酒不成席。而在中国官场,无酒没“关系”。

这次去北京招商引资,对赵先进来说是硬任务,必须完成,招待不好谁来投资?所以,“喝死也得往上冲啊!”

招商引资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重要理由,还有一个是招待上级检查团。一般遇到这两种酒场,必将是非常艰苦的战斗。

但更多的时候,酒则充当了官场上关系运作的一种润滑剂,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

对此,在基层挂过职的冯军旗深有体会,“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如果你不参加任何一个酒局,那么你势必会被排斥在圈子之外,很难融入这个群体。”

冯军旗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写道:“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

冯军旗发现,从喝酒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干部的关系网,因为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

“酒局凑成后,你一看都是什么人在场,你基本上就明白你应该喝多少酒了。”赵先进说,“有领导在场,你给领导敬酒的时候,总不能端着一杯水敬吧?也不能说‘领导干了我随意’吧?”

赵先进觉得自己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心理:向领导敬酒时,如果领导一口干了,他心里会升腾起一丝暖暖的感动;而如果领导只是随意沾了沾,他心里会有一种小小的失落。

但是,赵先进喝酒也有可以“随意”的时候,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他坐主宾的情况下。当别人敬他酒的时候,他竟发现自己多少也有点在意对方酒杯里代表的诚意。

赵先进甚至觉得自己仕途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的酒量不够大。在乡镇干了20年,好不容易熬成镇党委书记,“一个乡镇一年的招待费大概有20万—40万吧。”他现在成为县直某部门一把手,仕途上基本已经没有上升的空间了。

### “为什么喝茅台呀?因为它贵啊!”

“你说茅台酒到底有多好喝啊?说实话我真喝不出好来。那为什么喝它呀?因为它贵啊!”赵先进认为,中国官场上,喝的不仅仅是酒,喝的是权力和地位。

53°茅台从2000年的200元至300元,涨到现在的2000元,10年涨了近10倍。虽然2010年底,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发布“限价令”,表示零售价不得超过959元,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市场才是决定价格的力量。而“三公消费”对于茅台市场需求的拉动力有多大,不得而知。

“茅台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对不会到那个价格。”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曾公开表示,“以我的收入,在大酒店请不起一顿饭。”他也在反思为什么公款吃喝非得找大酒店,他认为,现在大酒店的价格确实已经很扭曲,而这也是由于公款吃喝导致的,“是公款吃喝扰乱了市场秩序”。

不少基层官员感叹“想喝一瓶货真价实的茅台不容易”,但是有意思的是,“有时候明知道不是真的,还是要喝。”

其实不仅仅在官场,在民间也是,酒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中国人喝的不是酒,是面子、是情谊……所以,有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想不想喝的问题,而是你非常难以拒绝。

祖籍山东现居香港的山东省政协委员黄惠珍来到山东,受到了热情招待,几天时间,让她感受最深的还是“喝酒过于频繁”,她在内地的公司高管已经成为中国酒文化的“受害者”。今年的省政协会上,黄惠珍以提案的形式号召山东人带头改变饮酒习惯。她认为,过量饮酒不仅仅危害身体健康,而且影响政府形象。

中国有很多劝酒词,美国人Josh对中国这种现象很纳闷:多喝酒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有益为何总是避免自己多喝?有害为何总是灌朋友多喝?

“无数次我听到人们说:‘我们也很讨厌这样,但这是文化。’文化是什么?词典里对‘文化’的解释是‘智力、情感、兴趣、举止和品位的发展、进步或提高’。”Josh怎么想也想不通。

民间有民间的风俗,官场有官场的规则,这些,在赵先进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改变的。

“不是公款吃喝太难治了,是中国的人情世故太复杂了。”赵先进最后说。

---

(上接B06版)

朱维铮匡正那些毫无根据的历史定论,他的大部分著述都致力于此,有人称之为普及,有人则称之为启蒙。他的著作很少有大的体系,只是在讲历史。朱维铮坚持独立判断,尽量不带个人好恶去评判历史,他常与人言:“历史在那儿,问题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怎么认识可能有分歧,但你不能否认历史在那儿。”

五四时期的启蒙疑古思潮继续在朱维铮身上有所体现,这是他的学术传统使然。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唁电中说:“(朱维铮是)坚持中国启蒙精神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他敢于挑战时下尊孔复古的逆流,令本人感慨不已。”

深刻的批判意识贯穿在朱维铮的治学、讲课和做人中。朱维铮爱骂人,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常有第一次见面的学者就能听到他对时下诸多学人的不满,对当下学风流弊更是深恶痛绝。他在课堂上言辞犀利,全不似一个七旬老者,学生遂送他:“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姜鹏以为这绝不同于“愤青”的表现,因为朱维铮字字有出处,他的批评源于他的深刻。

朱维铮拒绝一切影响学术独立性的东西。姜鹏提到,朱维铮每每轮到填写科研项目经费申请时,在回答项目有什么用的长长一栏里,朱维铮只会写上“无用”二字,于是他很多年都申请不到经费。

朱维铮曾经带着七八个研究生做经学史研究,课题经费才三四万元钱。而有些学者的课题一沾上“用”就有很多经费,尽管那些研究在他看来“无用”。

朱维铮努力让学术回归到无用,他甚至刻意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客观。他不是终身教授,也没有任何权力头衔。王元化与他私交甚笃,王曾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朱维铮便不登门,三年任期既满,朱维铮次日就上门拜访,说王元化三年做官一事无成,王元化叹息。

和朱维铮交好的学者不多。朱维铮嗜酒,以前常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章培恒相约宿醉,闹出不少笑话,如今两人前后相随而去。朱维铮烟不离手,他常在夜里工作,文章字斟句酌,待清晨满屋烟味儿才去睡觉。

朱维铮一直喜欢庄子,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历史研究同样被他看做是无用之大用。他论述清代小学,乾隆以为文人考据实属迂腐,但那些对传统经典的注释,就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抢救一样,正暗自摧毁着中世纪的殿堂。